

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 ——以李劫人、沙汀小说为中心

沈穷竹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以李劫人、沙汀小说为中心 / 沈穷竹 著.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21-8956-5

I. ①袍… II. ①沈… III. ①李劫人(1891—1962)
—小说研究②沙汀(1904—1992)—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7310 号

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以李劫人、沙汀小说为中心
沈穷竹 著

责任编辑：钟小族

书籍设计：张 晗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张 祥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1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网址：<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1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956-5

定 价：38.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袍哥与袍哥文化	15
第一节 袍哥与四川袍哥社会	17
第二节 袍哥文化及其基本精神内涵	31
第二章 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	49
第一节 四川现代小说作家对袍哥文化的接受与创化	51
第二节 袍哥文化在四川现代小说中的呈现	76
第三节 袍哥文化影响下四川现代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96
第三章 李劫人的小说创作与袍哥文化	103
第一节 李劫人对袍哥文化的吸纳与创化	106
第二节 “大河小说”：觅踪袍影	116
第三节 袍哥文化语境中的李劫人小说女性人物形象	130

第四章 沙汀的小说创作与袍哥文化	139
第一节 沙汀的袍哥生活体验及其文学表述的选择	141
第二节 袍哥文化对沙汀小说创作个性的影响	151
第三节 “乡镇小说”:袍哥文化的真实再现	164
结 语	183
参 考 文 献	187
后 记	201

绪 论

一、四川称谓由来及其行政区划的历史回顾

“四川”之谓，是有其历史演化过程的。四川民间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四川本指流经四川境内的四条大河——长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因为河在古时也叫作“川”，故而这四条河就简称“四川”。今天，我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便知这只是民间的一种戏说而已，缺乏有力的材料佐证，是不可信的。

其实，四川地区在古时称“巴”和“蜀”。“巴”是现四川东部的传统称谓，“蜀”是现四川西部的传统称谓。东晋时，常璩在其《华阳国志》中引《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①在西周初年，古巴国的疆域“大致在陕西南部的西汉水（今汉水）和四川东北部的东汉水（今嘉陵江）之间”。^②战国初期，其疆界为“东至鱼复（今奉节，笔者注），西至夔道（今宜宾，笔者注），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③一带，分布在嘉陵江、长江、乌江之间。秦国灭巴、蜀后，设蜀郡、巴郡以治，四川开始进入郡县制治理时期。汉朝初年，统治者仍承秦制，在巴蜀地区设置巴郡、蜀郡进行治理。公元前106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在全国设置十三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八郡五十六县。益州之称也自此开始。^④三国时期，跨今川、陕、甘、滇、黔、鄂六省，设益州，统二十四郡，比今天的四川行政区划略

①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0页。

② 陈世松：《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③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页。

④ 陈世松：《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5页。

大,称“蜀汉”、“蜀”。魏灭蜀后,到两晋时期,统治者分益州为益州和梁州,四川所辖范围有所缩小。南北朝时期,属南朝辖制,仍称益州。唐朝统一中国后,太宗时期,分天下为十道。剑阁以南地区称剑南道,嘉陵江以东地区基本都属于山南道。公元733年,玄宗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称“两川”,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今四川境内。公元757年,肃宗分剑南道为东、西两道,后代宗又合为一道。公元766年,剑南道再次被分为东、西两川,称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加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①

今天的四川称谓,其实源于宋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建立宋朝,并逐步用兵统一了全国,设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对四川进行管理。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又重新把今四川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划:益州路(后称成都府路,治今成都市)、梓州路(后称潼川府路,治今三台县)、利州路(治今陕西汉中市)和夔州路(治今奉节县)。这四路简称“川陕四路”,四川之称由此得名。^②自此,四川之谓便得以确立。到了元代,政府在四川设四川行省,治所成都,又于1288年迁往重庆,后因交通原因再次迁回成都。明朝时期,朝廷在成都设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廷平定四川后,在四川建立省制,称“四川省”。在这几个王朝中,重庆都是四川重要的组成部分。1912年,先后独立的重庆“蜀军政府”和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省。^③1939年西康省成立,四川所辖范围有所缩小。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迁都重庆,重庆于1939年升为院辖市,主要管辖范围为今渝中区一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国后短暂时间内,重庆脱离四川归中央直辖,后又回归四川,并于1997年再度恢复为中央直辖。

综上,四川自古即为巴、蜀之地,历史上先后有“巴”、“蜀”、“巴蜀”之称。后由于王朝更替,大多以“巴蜀”、“蜀”称四川。而“四川”的称谓出现得较晚,是自宋以后才开始的。梳理四川称谓的由来及其行政区划的历史演进,我们发现,

① 陈世松:《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② 陈世松:《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③ 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卷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巴蜀”或“巴”、“蜀”的称谓被赋予了较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四川”的称谓则更多用于行政区划。本书所探讨的对象“四川现代小说”中的“四川”,便主要是取其行政区划的意义。此外,重庆自古便称“巴”,自汉武帝时属益州,是今四川行政区划管辖范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历史上虽有短暂分治,但总体上仍属于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了现代。因此,在讨论四川现代小说之时,自然也包含重庆在内,以下就不再赘述。

二、论题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四川在历史上虽号称“天府之国”,但地域偏僻,地势险要,以“蜀道难”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片相对封闭却又物产丰饶的土地上,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却留下了许多光耀史册的鸿篇巨制,出现了彪炳千秋的文学大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川文学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四川作家在数量上有着不小的比例。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一书统计,四川作家人数名列中国现代作家各省份人数第三。其中,浙江 77 人,江苏 66 人,四川 44 人。^① 又据数据更全面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一书统计,江苏为 347 人,浙江为 307 人,四川为 230 人,也列第三位。^② 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进程之中,四川现代作家为其繁荣兴盛做出了可谓卓绝的贡献。

当下对于四川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得不是说存在一定的缺失的。研究者过多地把目光盯在了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上,很少去考察文本生成背后丰富的文化背景以及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成机制,也很少去了解文化与作家、文化与文本之间更深层的关联。即便有,也大多是笼统地做传统文化打量,很少切入一个具体的文化视角,更别说到去探究多元文化交融的复杂因素。本书选取地域文化中一个具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为切入口,选择最能代表时代特征和创作实绩的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来探讨四川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和历史价值。

^①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 年版。转引自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2 页。

^② 转引自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 页。

众所周知,无论我们把历史作为一种人类既已过去的事实或过程来看,还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人类对于过往的回忆或思考来看,我们均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华民族至清以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这段历史,是一段民族矛盾激化、社会矛盾突出、政治腐败、国家危难的复杂的历史,也是一个思想多元碰撞、融合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语境之下,社会呈现出复杂而又病态的发展态势:移风易俗、秘密结社、官僚腐败等等,不一而足。而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当中,各种民间社会势力开始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成为中国历史当中无法忽视的力量,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影响甚至引领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这其中,产生于四川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的袍哥,既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近现代四川人民的社会生活全部,最终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文学源于生活,又要反映生活,受一定的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本书所探讨的对象——四川现代小说,从其生成机制与作家价值取舍、艺术风格等方面,自然也难以绕开近现代四川特殊历史语境中袍哥文化对其的影响与塑造,四川现代小说作家也自然而然地会在其小说文本中去展现他们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这种血肉相连的文化渊源。故而,本书首先便着意于去重新梳理与诠释“袍哥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希望在四川现代袍哥文化语境中去探讨四川现代小说,做一次文学上的文化勘探,有针对性地对四川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及他们的作品进行巴蜀地域文化(这里主要是指袍哥文化)元素的挖掘,从而勾勒出袍哥文化激活四川现代小说家的文学意识与文学想象的脉络,探寻四川现代小说家与袍哥文化是怎样以及在哪些精神内涵上形成了契合,并由此探究文化的文本自在呈现,以图为四川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视角。

截至目前,国内外对于袍哥组织的历史演进、组织形态、制度规约、袍哥礼俗、社会影响、历史功过等方面,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刘师亮的《汉留史》、耘夫的《汉留全史》、朱

琳编著的《洪门志》侧重于从哥老会组织的历史发展、组织形态、制度规约作史料钩沉；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侯少煊和雁秋的《哥老会的缘起与清王朝对它的镇压》（选自《四川保路风云录》）、庄吉发的《清代哥老会源流考》、秦宝琦等的《哥老会起源考》、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与《从咽喉到哥老会》、罗尔纲的《哥老会与湘军》、朱金甫的《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沙铁帆的《四川之哥老会》、陆曼炎的《四川的哥老会》等主要针对哥老会的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梳理，扩充了史料。韩国学者尹恩子在其《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一文里，对探究哥老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做了很好的梳理，展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实绩。此外，蔡少卿的专著《中国秘密社会》、《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和论文《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卫聚贤的《中国的帮会》、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也主要对哥老会的源流、历史演进、组织形态、制度规约、社会影响进行了梳理，进行史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探讨。其中，吴善中还专门把时间节点定在了晚清时期，集中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哥老会进行了探究，成就突出。

专门对四川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组织情况与历史功绩、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四川保路风云录》、《辛亥革命史料》、《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辛亥革命回忆录》、《重庆文史资料》、《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以及隗瀛涛的《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欧阳恩良的《同盟会与西南袍哥》、《关于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熊倬云等的《四川袍哥组织初探》，刘波的《四川袍哥和辛亥革命》，黎丽的《四川哥老会与辛亥保路运动》，孔路原的《辛亥革命时期之四川会党初探》及四川各地县志。对袍哥做整体性研究的论著主要有王纯五的《袍哥探秘》，赵宏的《民国三大帮会之袍哥》，赵清的《袍哥与土匪》，其中赵清侧重探讨了袍哥与土匪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专著中，也有学者就袍哥的起源、组织形态、制度规约等有过专章论述，如易照峰的《中国黑道帮会》，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秦宝琦的《帮会与革命：江湖三百年风云录》，王纯五的《洪门·青帮·袍哥——中国旧时民间黑社会习俗》及论文《袍哥礼俗》专门对袍哥礼俗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披露了旧

时会党礼仪的一些弊端。

在硕士学位论文方面, 免灵君的硕士学位论文《四川袍哥研究》、王方的硕士学位论文《1940 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杨喜慧的硕士学位论文《解放战争时期四川袍哥研究》也主要从组织形态、制度、礼俗、发展概况、社会关系、历史功绩、隐语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于袍哥组织的研究。在论文方面, 一些学者主要针对袍哥组织的组织形态、制度规约、内幕以及与社会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好的探讨, 主要有熊倬云的《四川袍哥组织初探》、韩庆龙的《民国时期四川哥老会成员探析》、蒋益文的《揭秘哥老会》、张嘉友的《四川袍哥内幕探秘》、赵清的《重视对袍哥、土匪和军阀史的研究》、张杰的《民国四川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郝志伦的《四川地区袍哥隐语通用化传承初探》、王笛的《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 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王慧的《江湖隐语的文化心理分析》还分别从政治学、语言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对袍哥隐语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丰富我们对于袍哥组织的认识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王迪的论文《“吃讲茶”: 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史》还对袍哥的主要活动区域、活动方式及其政治学上的意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潮龙起的论文《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则对袍哥广泛参与的茶文化进行了探究, 对袍哥组织的封建落后性和共济互惠的特征进行了全面揭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于袍哥组织的研究。

综上, 自晚清以降, 学界对于袍哥组织的研究可谓已经是硕果累累了。然而, 相对而言, 对于袍哥文化的研究却又显得极为薄弱。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 袍哥文化这个提法并非笔者首创。在当下日常社会生活中, 无论是在口头、网络论坛、报刊等方面, 文化这个词不时见诸口头笔端。在学术领域, 以李怡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巴蜀现代文学、四川现代文学的研究专家们早已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在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里, 他论述民国时期巴蜀社会文化的构成时曾说: “求取袍哥组织的接纳和保护与投靠某个军阀同样重要, 甚至也更实在, 这就形成了四川所特有的浓厚的‘袍哥文化’基础。四川现代

作家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润过。”^①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还列举了沙汀、吴虞、康白情等人的袍哥经历或袍哥家族背景来作为例证。

贾剑秋在其《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里论述西南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沙汀的小说，在谈到文化对沙汀创作的影响时，也说：“沙汀的乡土小说之所以具有蜀文化的浓郁色彩，在于他的社会批判之笔，蓄载了蜀地历史文化遗存与现实文化的实录。从蜀地历史文化遗存在其笔下的表现来看，他的乡土小说特别展示了蜀地文化的两种传统成分——茶文化和袍哥文化。”^②他也在其文中使用了“袍哥文化”这个概念来谈沙汀文学艺术的文化意识来源。

另外，周万国在其《从墨子文化到袍哥文化》一文中梳理袍哥文化历史渊源时也提出过“袍哥文化”的说法，认为袍哥文化与墨子文化之间在精神品质上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李庆信在探讨沙汀小说艺术的时候，也特意关注过袍哥组织对沙汀创作的影响及其文本呈现，但遗憾的是没有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谈。贾胜楠的论文《论〈死水微澜〉中的袍哥文化》对李劫人小说《死水微澜》中所展现出的袍哥文化内涵及其局限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对袍哥文化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进行了反思，可惜没有展开，也欠缺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刘天森等的论文《黑社会组织形成及其社会控制方式——基于成本—效益的“袍哥文化”分析》则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袍哥文化对于社会的危害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袍哥文化对黑社会组织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由此来探讨进行社会控制的方式。王小箭在其《被“袍哥文化”塑造的重庆生态》里谈重庆的人文生态时也注意到了袍哥文化的影响。刘延刚在其论文《试论袍哥与四川盐文化传播》里着重探讨了袍哥文化对于自贡盐业的规约与影响，其专著《四川袍哥史稿》中不但进行了充分的史料钩沉，而且还从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探讨了袍哥组织存在与消亡的原因和历史的必然性，对袍哥文化对于四川人民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究。王笛的《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则分别从档

①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② 贾剑秋：《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M]，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27页。

案叙事、社会学调查叙事、小说叙事、回忆录叙事、文史资料叙事等几个方面对袍哥组织进行了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从而试图还原1940年代的袍哥历史真相。贺文峰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劫人小说创作研究》,韩晶的硕士学位论文《“川味”群雕——论李劫人“大河小说”的人物塑造》,伍加伦、王锦厚的论文《论李劫人和他的〈死水微澜〉》等主要对李劫人小说文本中的袍哥形象及其意义进行了重点分析与阐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袍哥在历史上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姜峰的论文《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侠文化形态》则从民间侠文化的视角论述了侠文化对四川现代小说中袍哥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杨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沙汀小说方言俗语研究》则主要探讨了沙汀小说中的袍哥隐语,并对沙汀著名的“三记”里的袍哥隐语做了完整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袍哥文化。

不无遗憾的是,在学术界,使用“袍哥文化”概念来谈四川(或者巴蜀,或者更多地集中在对李劫人、沙汀作品的文化解读上)文学的人并不少,但没有一个学者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或者分析其文化内涵及其特征。学者们仿佛更习惯于直接运用这个概念,仿佛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笔者还发现,他们在运用时也都把袍哥的组织形态、制度规约、社会影响等简单地等同于袍哥文化的全部内涵。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包括上述学者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在内,专门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从事四川文学研究的论著及论文,都很少涉及袍哥文化这一重要的地域文化形态。即便有所涉及,也是用简短的篇章进行学术扫描式的探究,并没有做过多的深入研究。李怡在《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里虽提到了袍哥文化对于四川现代作家的模塑,但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邓经武的《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李大明主编的《巴蜀文学与文化研究》,李怡、肖伟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文化视野》,张瑞英的博士学位论文《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研究》及论文《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文化渊源》、《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表现艺术》,张建峰的论文《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四川文学》,邓伟的论文《时空视野下的互动显现——试论沙汀的巴蜀地域文化资源》等也主要是从巴蜀文化中去寻找激发作家文学意识与文学想

象的根源,即便涉及袍哥文化,也不过是部分章节或者单篇论文而已。邓伟的硕士学位论文《现代四川作家与巴蜀地域文化论》、罗静雯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艾芜〈南行记〉与巴蜀文化》、马芸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派”》则直接探究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关联。罗国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李劫人、沙汀小说中的“川味”叙事》,也是从巴蜀文化的视角,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阐释,在本土文化资源里寻找作家作品的文化根源。他们近乎无视了现代四川袍哥文化的独特语境。

张永的《“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李怡的《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四川文学中的方言》、《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张建锋的《论孕育四川作家的文化生态因素》,谢应光的《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围与当代四川的文化建设》,邓经武的《地理环境对现代四川作家的影响》,付金艳的《上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的文化构成》,张瑞英的《蓬勃张扬的生命强力——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强势人物形象分析》、《理性的负轻与生命的张扬——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论略》,皮晓宇的《论沙汀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巴蜀特色》等论文,无论是从民俗学、语言学,还是从生态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面入手谈文化与四川文学之间的关联,主要阐述的仍然是人物形象的文化意义,很少触及袍哥文化。

港台以及海外学者绝大多数也缺乏对四川现代文学的关注,少有的一些研究也仅仅停留在个别作家比如巴金的作品、创作道路及思想发展上。当然,国外的巴金研究状况也是不平衡的,有的还处于翻译、介绍阶段;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俄罗斯等,已脱离了介绍巴金的生平和作品的阶段,而进入了综合论述、纵横比较、深入剖析等更高层次的研究阶段。但总体看来,港台及海外对四川现代文学的研究尚不成体系,也缺乏深度,更不要说上升到深刻的文化层面上了。

由此可见,虽然学界对于四川现代文学的关注及其研究在整体性研究、作家专题研究、作品研究等方面均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有关四川现代作家与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性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取得的实绩也不算丰厚,主要集中于对代表作家进行个案研究,而且对文化与文本、文化与作家创作的关联的研究也较少涉及,并且还主要集中于探讨巴蜀文化与近代以前的

四川文学的关系上,对四川现代文学的研究也不够多,力度也还远远不够。对巴蜀文化中的重要文化形态——袍哥文化的论述更是鲜有涉及,只有少量章节和零星的论文,更遑论专著或硕士、博士论文。不得不说,这是研究四川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一个巨大空白。

故而,就上述研究现状来讲,笔者认为,对四川现代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应该还有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关于四川现代作家作品里蕴涵的四川地域文化的研究,迄今仍然有深入挖掘的必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袍哥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有什么样的内涵或特征?这种文化形态又究竟是怎样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它在文本里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弄清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阐述四川现代文学和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化根源、文化品性的当务之急。故而,我们可以这样说,研究袍哥的历史演进及其组织形态、社会影响、价值体现,探讨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丰富我们对巴蜀文化的理解,深化对四川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的认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为了深入探讨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作家及其作品之间的密切关联,结合袍哥文化形成、发展和产生影响的具体情况,从而在本书中再现袍哥文化的宽度与深度,笔者选择了李劫人、沙汀两位在四川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家,以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作品为中心来进行探析。

本书所探究的对象——四川现代小说,主要是指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的四川籍小说作家以四川为题材的作品。路翎虽出生于江苏,但他15岁便入川,诚如李怡教授所言:“这是一位在四川社会最后形成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青年,是来自四川社会的感受直接推动着他成长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①因此,路翎对巴蜀地域文化的感受也是极为深刻的,并在其作品中大量呈现,况且他“对四川人精神品质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不仅为当时其他的入蜀作家所不及,恐怕

^①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也令许多的当代四川作家自愧弗如”^①，因而路翎也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畴。

在四川袍哥文化语境中出生、长大的艾芜，其笔下人物虽多与四川无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四川题材作品，但其创作中却又明显地体现了深受袍哥文化影响和塑造的文化意识与创作心理，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贴近四川地域个性，呈现出鲜明的袍哥文化精神内涵。因此，艾芜的小说也纳入本书的探讨范畴之中。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方法

本书首先对袍哥文化进行概念界定，对其内涵进行归纳，继而考察四川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成机制及文本生成背后丰富的文化背景，厘清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作家及其文本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并以李劫人与沙汀的小说为中心，重点探讨李劫人对于袍哥文化的接受与创化，和袍哥文化对沙汀独特文学个性的影响。通过文本细读，梳理他们小说中袍哥文化精神内涵的具体呈现。

第一章梳理袍哥组织的源流、称谓由来、组织形态、历史演进以及社会影响，阐述四川袍哥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重点界定袍哥文化的概念，并把袍哥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义气为先、反抗精神、民族意识、“丛林法则”下的强者崇拜。

第二章探索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时期四川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化心理。重点探讨他们对袍哥文化的接受与创化，致力于寻找他们的创作与袍哥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探讨地域文化资源向作家个人资源转化的途径。本章分别从袍哥精神、强者崇拜、袍哥民俗风尚等几个方面来阐述袍哥文化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从而总结出在袍哥文化语境下的四川现代小说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第三章探讨李劫人及其创作与袍哥文化之间的关联。重点探究袍哥文化既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对李劫人的个性心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和文化品性、文学思想的塑造与濡化。本章选择李劫人富有代表性的“大河小说”来阐述袍哥文化基本内涵在其文本中的具体呈现，重点探究袍哥文化对四川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李劫人笔下的三个女性形象（蔡大嫂、伍大嫂、黄澜

^①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生太太)的行为模式、个性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及其表现。

第四章梳理沙汀与袍哥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探讨袍哥生活体验及袍哥文化与沙汀选择文学道路的关联,阐明袍哥背景及故乡安县浓厚的袍哥文化语境对沙汀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本章分别从乡土书写的自觉确立与讽刺艺术的自然运用两个方面,重点阐述袍哥文化对沙汀小说创作个性形成的影响。从“强者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乡镇社会的罪恶根源两方面,概括袍哥文化精神内涵在其“乡镇小说”中的真实再现与负面文化价值的体现。

总体来说,本研究属于选点的专题研究。袍哥文化是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现代四川社会,袍哥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已经深入川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模塑和濡化着他们的性格心理、思维模式,并和巴蜀传统文化、西方异质文化激烈碰撞、交融,在近现代川人的生活和观念中呈现出一种芜杂、胶合的态势,呈现出其正反两方面的价值表现与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出生、成长的四川现代作家,必然受到袍哥文化精神内涵的影响与模塑。表现在其创作之中,即是这种文化形态对其文化意识的浸润,对其文学想象、创作意识的进一步激活。当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作家在精神上取得了高度契合之后,这种地域文化资源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作家的个人资源,从而在乡土文化的滋养下,成就其文学创作的宏伟事业。

本书准备在对四川袍哥组织进行历史钩沉的基础上,对袍哥文化的概念和精神内涵做进一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四川现代小说作家文化意识的形成,阐述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作家的有机结合。在遵循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考察四川现代小说生成的文化背景以及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成机制,探究文化与作家、文化与文本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本书重点选取四川现代小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小说作家——李劫人、沙汀及其作品进行选点研究,对他们对于袍哥文化的接受与创化、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转化、文本的文化呈现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探讨。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 1.采取史论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梳理袍哥组织的源流、历史演进、组织形态、

制度规约、社会影响、四川袍哥社会的形成与概况,来界定袍哥文化的概念,归纳袍哥文化的精神内涵。

2.运用文化学、历史地理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探讨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作家、文化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作家(李劫人、沙汀等)及其作品之间的关联,探寻他们在精神上对袍哥文化的传承与创化。

3.通过文本细读以及文史结合、社会文化批评的方法,梳理文化与社会、文本与时代、文化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选取典型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袍哥文化语境下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形象意义。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本书的重点是:第一,界定袍哥文化的概念,阐述其精神内涵;第二,探讨如下问题:袍哥文化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形态是怎样在四川现代小说作家身上发挥作用,影响和模塑他们的文学创作意识、文学想象、文学风格的?四川现代小说作家又是如何把这种地域性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的?四川现代小说作家在哪些层面上与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形态取得了精神内涵上的高度契合,并最终融合到他们的文本创作中去的?以李劫人与沙汀为代表的四川现代小说作家是如何接受袍哥文化的?他们对于袍哥文化又进行了怎样的创化?这些既是重点,也是本书的难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文化既包括物质财富又包括精神财富,并且包含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是一个近乎无所不包的复合体。从其表现出的文化趋向与特征来看,袍哥也应该具有文化的特质和内涵。第二,袍哥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是有其丰富的精神内涵的,主要体现在义气为先、反抗精神、民族意识、“丛林法则”下的强者崇拜等方面。第三,文化的主体是人,是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会濡化和塑造人,

^① 王威孚,朱磊:《关于对“文化”定义的综述》[J],《江淮论坛》,2006年,(2):192。